

客家研究文丛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黄药眠

评传

HUANGYAOMIAN PINGZHUAN

刘克定
编著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客家研究文丛

黄药眠评传

HUANGYAO MIAN PINGZHUAN

刘克定 编著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药眠评传/刘克定编著.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1. 4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客家研究文丛)
ISBN 978-7-5623-3354-8

I. ①黄… II. ①刘… III. ①黄药眠 (1903 ~ 1987) —评传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50957 号

总发行: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广州五山华南理工大学 17 号楼, 邮编 510640)
营销部电话: 020-87113487 87110964 87111048 (传真)
E-mail: scutcl3@scut.edu.cn http: //www.scutpress.com.cn

出版策划: 乔 丽

责任编辑: 陈 超

印刷者: 广州市穗彩印厂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张: 11.75 字数: 231 千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1 000 册

定 价: 23.5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录

黄药眠：清名上帝所忌（代序）	(1)
关于黄药眠	(10)
伟大的母爱	(12)
读书——持之以生	(22)
走文学之路	(27)
美学的第一课	(31)
在汉堡和列宁格勒	(35)
看到力的崩裂	(38)
上海岁月	(50)
从法捕房到军人监狱	(57)
到延安去找党	(65)
战火召唤诗人	(72)
中国的“荷马”	(78)
香港，文化人大迁徙	(86)
不是考证的考证	(96)
诗人的噩梦	(107)
牛棚观察	(129)
文学创作三个时期	(136)
拿起艺术的武器	(165)
参考文献	(177)
后记	(179)

黄药眠：清名上帝所忌（代序）

谭元亨

五年前，随省府参事室赴梅州考察，我曾特地要求上药眠故居一走，没想到染病打点滴，只好托黄鹤老师们了。回来后，诸师感慨万端，这么出名的诗人、学者，其故居却无人关照，残败不堪，已近坍塌了。

虽有遗憾，却也不无收获，黄老师找到了黄药眠当年回乡手书的《秋日杂诗四首》，自是如获至宝。黄药眠在诗旁注的日子，是1962年12月5日。那正是一个严霜在地、北风凛冽的日子，他手录这四首诗，如今亦不曾确定是否发表过。而这正是他被打成北京六大右派教授之一之后的五年，五年里，风刀霜剑严相逼，不知他是怎么过来的。

诗中，则多少透露了一点信息。

这里谨原文照录下来。

秋日杂诗四首

中秋

人生难得凡中秋，
月照南窗雪满头。
偶忆儿时搞花朵，
曾随阿母未知愁。

（吾乡旧俗中秋之夜，呈百花以献目迎接嫦娥，我小时每到中秋节黄昏，就跟母亲到处去摘花朵，以供夜里迎月之需，故云。）

秋

秋风摇动露蒙沙，
曾是风流处处家，
今日已无春如色，
尚余残梦到天涯。

菊花

粉至金红最聘亭，
秋风频抚吐芬轻，
知君本是非凡骨，

本文中专门论述的一位——黄药眠。他与前二位，无疑都是同时代人，一道经历过中国20世纪初叶那个狂飙突进的时代，亦一样经历了民族危亡的严峻时刻，用他本人的话，也是他自传所用的两个字：“动荡”，充满动荡的一生，不仅仅是20世纪上半叶，而是整个世纪。他辞世之日，已是1987年9月了，一个世纪只余下20多年了，不过，他却是三位当中活到最后的一位。而他经历的“动荡”，自比前边二位要多得多，也深刻得多。

文章憎命达，更何况一位才华横溢、激情四溅的诗人呢！他写的是诗，而他所经历的，又何尝不是一部史诗呢？尤其是他晚年的口述史，读下去，更有着史诗一般的冲击力——这是用鲜血与生命，用近90个春秋，凝聚成的一部史诗。黄药眠不仅写诗，而且，还是一位著名的美学教授，本来，写诗的人，本身就需要一种禀赋，那便是不同一般的审美感受。可以说，离开了对美的追求，对美的审视，就不会有诗情的勃发，而这是需要对生命的超越，对生命力的解放方可以达到的。如果说，三位20世纪的大诗人，在诗歌创作外，郭沫若有他的历史学包括历史剧创作，李金发则有他的雕塑——那也是立体的诗。历史是时间的诗，雕塑是空间的诗，那么黄药眠的美学，则是心灵的诗，那比时间与空间的世界，还更博大、无垠。因此，我们解读这位诗人，解读他的诗，更需要整个身心的契合——三位客家诗人，给我们展示的，是怎样一个世界！

我们不知道，究竟能进入这个世界有多深？

二

“动荡”二字，是黄药眠对他一生的概括：“五四”时期的激进，30年代入狱的磨砺，抗日战争大撤退的悲壮，民盟之际的独立不倚，反右与“文革”的落难，改革开放以来有奋发与遗憾……无一不与“动荡”二字相关。这是他对命运的认识，同样，也是他无以摆脱的宿命。

早在十年前，我在开列客家的一部百集文丛时，当中就有黄药眠的评传在内，而且是在人物评传中的前几位当中。他当然是我的老师一辈的。在我而言，几重身份都与他“重叠”，作家自不消说，他是著名的美学家，而我，则在他家乡一所高校主持一个美学的学科点，培养美学的研究生。当然，还有一重身份，都是“文革”中，有着惨死遭际的幸存者——对，这个身份无疑是最确切的，因此，为他立传，当义不容辞。可以说，对于研究自己的创作同行，自己的理论先师之际，当拥有知人论事，谙熟艺规的优势，当有把握写得很精彩，很深入，切中肯綮，鞭辟入里。但我最终未能提起笔来，也许，是太熟悉了，反而不敢下笔了。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之间的“身份认同”。

毫无疑问，存在的身份认同，是足以激发如陈寅恪所说的“理解的同情”，并

产生在价值观、人生观上的共鸣，深入探究的动力，甚至视为自我辩护，自我实现，有着相当积极的意义。可又为什么“望而却步”，这毕竟不同于法律意义的“利益冲突”，须“回避”的身份吧？人的思维也许每每就这么奇怪：太熟悉了反而认识了，太冲动了反而动不了笔，愈来愈意识彼此认同的成分愈多，重要性愈大，反而产生一种焦虑：剖析他人等于剖析自己，而这却是很难做到的。也就是，反而担忧写不好这个有“身份认同”的人物。毕竟，黄药眠一生中，也有多次“身份认同”的问题，而集中体现在如下两次——这在我，当是身同感受的。

第一次，由于抗日战争爆发，这位前共青团中央的宣传部长，在几乎所有人都变节之际，一个人坚持下来，终于被营救出来。出来见到组织后，第一个要求，便是要上延安去。其实，如果他应当时组织要求留下，他的人生轨迹就完全不一样了。他如愿以偿，上了延安，却不被“认同”，不仅不能恢复共产党的党籍，还遭到种种猜疑，满腔的热血，矢志不移的忠诚，此时竟被泼上一大盆冰水。于是大病一场，不得已离开延安去治病。后来，他征得张友渔的同意，加入了民盟，仍旧是共产党忠实的盟友。^③如此简单直白的追述，也许人们难以感受到他在“认同”的道路上，内心的那种折磨，这恐怕比在狱中的折磨要沉重个一百倍，而这，却是难以形诸笔墨的。

第二次，则是在1957年，他成了北京著名的右派“六大教授”。本来是大鸣大放，却一下子成了“引蛇出洞”……今天，当我们重读他“鸣放”之际的文章，如《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④如《由“百花齐放”所想到的》^⑤会觉得并没什么，甚至连“忠言逆耳”的“逆耳”都说不上，怎么那时就会被视作大逆不道了呢？他当时是又以满腔的热情与忠诚写下上述文章的，结果却被视为反动，最终以二十多年的右派生涯为下场。事先的“身份认同”与事后的“身份”否定，这次的感受，恐怕比上一回更为痛楚与沉重。显然，此时已年过半百的他，仍生活在，或者说，他的头脑，仍坚守在一个理想的世界中，固有的观念自始至终未变，甚至在再次碰壁后不改初衷。这是一种至贵的品质，不是一般人能有的——所以，他那么痴迷于美学理论的建构，当是同样在“美的世界”中免却现实的痛苦，麻木掉实际生活中得到的无情。正因为这样，在二十多年的右派生涯中，他一直在坚守自己的底线，由美及理想编织成的底线，从而可以无视他人是否在意他自己的“身份认同”，对这认同的臧否，所有的不公正都无以伤害到心灵的深处。

这在他，当是一位知识分子良知的恪守，对社会的不公正的批判与抵制，渴求正义与公平。就如韦伯所说的，知识分子超然气质天生是与有缺陷的社会秩序难以协调的。知识分子所认同的身份，绝不是局外人，绝不是袖手旁观者乃至附庸、跟屁虫……这便是他为之罹难的那些文章所清晰地传递出来的信息，是他人

格的表示。

这两次“身份认同”，在他人生的轨迹上，特别是思想的发展上，打下的烙印有多深，无疑都反映在他的作品中，包括他的学术思想、美学观上。这对于他来说，“国家不幸诗家幸”，去锻造他的诗行，去沉积他的思想当是不乏积极意义的。灵魂的折磨，当然，也同样是逃脱不了肉体的折磨，其负面的价值是否让位于正面的获得，我们却只能存疑——时代的局限，毕竟不是那么轻易超越的。

一位年轻的共产主义信仰者，年迈的知识分子，在他并无身份转换的问题，他坚守的仍是社会正义与人道理想，两次身份认同的危机只能更坚定了他对自己身份的确认，不曾对此产生迷失。身份的迷失，意味着找不回自我，找不回归家之路，找不回精神的故乡，如同失忆者一样，认不回自己为之奋斗过的一切。黄药眠动荡的一生，并不曾发生这种身份的迷失，尽管上面提到的两次身份认同的危机是那么严重，但他始终把持住了自己，所以才那么坚定地恪守住已有的信念。

所以，他最后选择，则是诗人或诗歌创作的近亲——美学。也许，这也是人道理想最好的学术载体。

三

黄药眠是以写诗步入文坛的。

同那个时代的诗人一样，他们大都是在激荡的“五四”狂飙中脱颖而出的，他们的激情，他们的审美取向，都被浪漫的理想主义所左右，如他写在“五四”后不久的那首《黄花岗的秋风暮雨》：

我仰著悲怀匆匆地寻觅归途，
风雨凄泣犹听幽魂啜泣，
回看那黑影中的岗上丰碑，
碑上的神人啊，犹是昂首雄立。

在凄风苦雨中“雄立”，这仿佛也是黄药眠一生的写照，这自然也是他的一种身份认同。年轻的情怀，当影响一生。以至于在狱中高墙下，他亦这么驰骋自己的思绪：

啊，云，你多么自由，天空是这样宽广，可以任由你自由自在地飞翔，有时你还可以积聚在一起，如高山，如层岩，又可以松散开来，如棉絮，如羽毛，你可以像一顶帽子盘盖在高山顶上，你又可以化作迷茫的雾，并且还可以走到我的窗子面前化成细雨，滴沥敲窗，气压低沉。

我望着窗子外面的阴沉的天气，一切东西都好象变了形看不清了。我不觉长吁一声，对天说：

黄药眠意识到了，清醒地意识到了，但是，他并未放弃把民主作为一个奋斗目标，孜孜以求。所以，10年之后，也才有他被作为六大右派教授揪出来的悲剧。在他起草的《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中，虽然写得小心翼翼，颇有分寸，但仍对“民主作风不够”、“严重的以党代政和党政不分”等提出了批评与整改措施。

“右派”岁月，牛棚生涯，这都是“民主”惹的祸，从此，黄药眠在晚年的20多年中，失去了很多，包括仰望天上云彩的自由。在这漫长的煎熬中，他只是能偷偷写下片言只语以记录住自己瞬间即逝的灵感，这便是自1957—1981年空白了24年之后，于1981年5月花城出版社出版的《面向生活的海洋》。人生有几个20年？对此，他却说：“在漫长而宝贵的十年里，我仅写了这么一点，还做贼似的冒了很大的风险。”短短一句话，潜藏有多么巨大的历史内容、人生遭际，以及信念与意志呀！

坚忍，是我们民族的美德，在客家人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黄药眠这位现代三大客家诗人当中的一个，他的坚忍，当达到一般人难以达到的程度。这有如他的诗中所写的，是铁槌击打下，溅出的火花——这火花，便是诗，便是他诗化的人生。

四

从诗歌创作，走向美学研究，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同样，从浪漫主义理想，走向审美境界，当是水到渠成。然而，从动荡的、乃至灾难性的人生走向美学，莫非也有某种机缘？

到了晚年，作为我国著名的美学教授黄药眠，似乎已超越了一切，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诗的激情化作了暗涌，从而更有了力度，理想的感奋业已平稳，于是具备了韧性。那么，灾难的人生，又给予美学以怎样的昭示呢？莫非说，人的审美体验，当是对生命悲剧的审视，并且在这审视中予以反抗，加以超越方能得以实现，从而成为人类生活中的一种独特的方式？莫非说，在经历了众多的苦难、痛楚之余，人们当意识到理想的自由无以到达，甚至可望而不可即——我刚刚在写“二秦”（秦兆阳与秦牧），临终感悟时讲到了这一点，从而只能借助审美活动，使之成为释放生命力的一种补偿？这似乎正是黄药眠学术中的生命元素，他那动荡的人生给美学的悠远的呼唤与启迪。因此，他在《美是审美评价：不得不说的话》一文中，借普希金诗中写的书中夹的一朵枯萎的、失去清香的小花，引发起的审美联想，并且借此强调“个人的情绪色彩”。而他的美学论文，更强调首先应从“生活与实践去找寻根源”，这便直接指向了所有人，包括个人的人生了。因此，人不要受现实世界的种种束缚，至少心灵不要受这束缚，在审美的直

觉瞬间冲破这一束缚，把心灵引向广阔的自由天地，这便是对生命悲剧的超越。人，只有在审美中，获取心灵的自由。

当然，这种超越，便是审美的超越，做到了超越，便可以上升到自由的境界。因此，审美的自由，便是主观情趣对于客观规律或法则的超越，“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同样，也是对“洞穴的幻象”即理性教条的超越，生命本身就是感性的，后天的理性对这一感性造成种种的压迫与束缚，让人的直觉潜能得不到释放，而这后天的理性每每又固化为教条，从而对生命加以了阉割……

在精神自由与功利欲求上，审美自然是属于前者而非后者的，但如果不超越功利，也就无精神自由可言。陈寅恪的“独立、自由”提法，本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真正的追求，大学当中更应当如此。而今日之物欲，早已铺天盖地，吞没了不少人，把人降格成了动物，而且是低级动物。当年，黄药眠被抓到南京的反省院，反动派不正是以这种物欲，诱降了不少他的同事们么？这对他，无疑是有剜心之痛的。他强调审美的自由，在于精神对物欲的超越，是与他的亲身体验分不开的。只有在审美中，人们才可能视功名利禄为浮云，方可摆脱功名利禄对人的束缚，才能战胜人的异化。进而言之，审美的自由，更是个人的自由，个体生命对社会压力的逾越。自我实现意味着什么？总而言之，当今世界，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会对个体生命造成种种的压迫、扭曲，当年，在南京如此，在他去延安受到的不公平对待，亦如此，反右则更不用说了。因此，黄药眠强调的“生活与实践”的美学观，不是服从，而是寻求，是超越。也只有审美，方能够实现这一超越。他的美学，不仅仅是生活的美学，实践的美学，更是生命的美学，是生命挣脱一切束缚实现超越达到的美的境界。当然，这也包括对个人自身局限的超越。

很多人，对一切横逆，一切苦难，都已经麻木了，生命的悲剧在于接受而非反抗。然而，一位诗人，一位思想家，是不会中止自己敏锐的触角，他当凝聚这些苦难以激发思想的喷溅，让苦难去强化对自由与美的冲动与追求，并坚信正是在这种高压下，生命方可以全面地释放与超越，一如他写的铁锤锻击下四溅的火花。他晚年的美学观，正是建立在整个一生的苦难的超越上面。而他，就这样在美的追求理想上，又一次获得了“身份认同”。

因为这是他苦苦寻找的精神故乡。所以，直到最后，他仍旧是一个有着坚定信仰的“神人”。一个依旧怀着感伤浪漫情怀的诗人。一个对人道理想、审美追求矢志不移的大学者。“精神四达并流，无以不及，上际于天，下蟠于地”。庄子此语，于黄药眠而言，可言中否？

关于黄药眠，想说的还有很多。对于这么一个可引以为“身份认同”的先师、同仁，我本责无旁贷在这套文丛中给他留下应有的一席，并且亲自动笔。但我最终没能下笔，而是把“球”给了克定，不仅仅是怕“当局者迷”，而是有太多的思

虑。好在克定早有准备，对药公心仪已久，他的心态，当比我健康得多，由他捉笔，当会写得更到位一些。

“清名上帝所忌，得谤可以销名。”^⑦不知黄药眠对这一古训熟知否？用一生的曲折，消除上帝的妒忌，去掉所谓的“清名”，又何尝不值呢？若为上帝所忌，后果当多严重？

何况这一生的曲折，还有诗歌、有美学作为补偿呢？而综观其一生，无论是诗人、学者、革命家，抑或幸存者，革命的幸存者，都始终如一有一个身份认同，那便是信仰者。对理想与美的追求，贯穿了他的一生。人是不可以没有精神自由的，美是自由的象征，他正是在晚年的美学追求中达到了心灵自由的境界，尽管天不假年于他，晚年未能完成他的美学五论——《创作论》、《风格论》、《典型论》、《文体论》、《鉴赏论》，但他却以他的亲力亲为，昭示了后人，这五论，也为今日的学者所弥补，不应有憾了。

今日梅城烟雨里，尚祈神人吟新诗——阅毕黄药眠风雨一生，感慨系之，此志。承蒙刘克定的辛劳，我们为黄药眠做传的愿望，终于在他的笔下得以实现。克定治学严谨、文思敏锐，勤于考证，花了好几年工夫寻找相关资料，真是“袖手于前，疾书于后”，加上文思如水，随物赋形，颇有阅读和研究的价值。其另一部评传《张资平论稿》去年已为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现在又写出了这部学术品位颇高的药公评传，受到社会广泛关注，令我感动，故在此表示谢忱！

① ② 华林（李金发）《烈火》，1928年《美育》杂志第一期

③ 参见黄药眠《黄药眠口述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④ 原载《师大教学》1956年7月18日第161期

⑤ 原载《文艺报》1957年5月12日第6期

⑥ 参见黄药眠《黄药眠口述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23页

⑦ 陈继儒《小窗幽记》

关于黄药眠

黄药眠（1903—1987年），原名访、荪，梅州人。早年就读于广东省立第五中学（梅州中学）。1921年秋考入广东高等师范英语系。先后在百墩中学、金山中学任教。青年时期，追求民主与科学，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1927年，在上海加入革命文学团体“创造社”，任该社出版部助理编辑，在《洪水》、《创造周刊》、《流沙》等报刊上发表作品，开始文学创作活动，并出版诗集《黄花岗上》。192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9年在上海艺术大学兼课，是年冬赴莫斯科共产国际东方部从事翻译工作。1933年冬回国，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1934年10月被民党当局逮捕，判处10年徒刑，押送南京中央军人监狱。1937年由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出面保释出狱。是年奔赴延安找党组织但未获接纳。先在延安新华通讯社工作，后到桂林与胡愈之、范长江等组织国际新闻社，任总编辑。1941年到香港，在廖承志领导下从事国际宣传。同年12月，香港沦陷后回到梅县，在东山中学任英文教员。不久赴桂林，后到成都、昆明，从事创作和理论研究，出版散文集《美丽的黑海》和发表长篇论文《论约瑟夫外套》。1944年在成都参加中国民主同盟，积极参与、推动抗日救亡的民主运动。

1946年初，在广州农工民主党主办的《人民报》任主编，是年夏主办民盟机关刊物《民主星期刊》以及《民主与文化》。同年秋，在香港参与创办达德学院，任文学系主任，并参与民盟的领导工作，主编民盟中央机关办的《光明报》。

这一时期，出版了著名长诗《桂林底撤退》，小说集《暗影》、《再见》。理论研究方面也取得新的突破。出版了论文集《论走私主义者的哲学》等。

1949年5月，黄药眠从香港到北京。7月，出席全国文代会，后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50年代初期和中期，先后出版《沉思集》、《批判集》、《初学集》。1957年，他为民盟中央起草了《我们对高校的领导意见》，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成为“六教授事件”受害者之一。“文化大革命”期间，虽受“四人帮”迫害，但仍坚持写作，短论集《面向生活的海洋》，就是在他受监视期间一条一条地小纸片儿上写出来的。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过去罗织在黄药眠身上的一切不实之词被推翻，恢复了他的名誉。他虽年事已高，仍倍加努力，积极为教育事业辛勤工作，发表了《悼念》等诗歌、散文和美学、文艺学论文，培养了一批博士、硕

士研究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药眠历任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第四、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民盟第一至五届中央委员（一、二、四、五届中央常委）、民盟参议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文联常委、副秘书长，中国作协常委、顾问；全国高校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等职。

1987年9月3日病逝于北京，终年84岁。



“痛苦是无穷的，它具有种种形式。有时，它是由于物质的凌虐，如灾难、疾病、命运的徧枉，人类的恶意。有时，它即蕴藏在人的内心，在这种情境中的痛苦，是同样的可悯，同样的无可挽救；因为人不能自己选择他的人生，人既不要求生，也不要成为他所成为的样子。”

罗曼·罗兰《米开朗琪罗传》

伟大的母爱

人杰地灵的客家香格里拉——我的母亲——一位沧桑的农家妇女仁慈伟大的母爱——客家文化，给年轻的诗人以灵气，以独立支持的人格

梅州，位于广东省东北部、闽粤赣三省交界处，是个风景很美的地方，人杰地灵，出过许多诗人、文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巨贾。梅县建于宋太祖开宝四年，又叫嘉应州。传说当年这里盛产梅花，山山岭岭，河畔井旁，梅树无数，一到寒冬，树树著花，非常好看。是客家人聚居、繁衍之地，故有“客都”之称。

一千多年以前，南方并没有客家人，也没有“客家”这个词。客家先民其实也就是原来居住在汉水以东、颍水以西、淮水以北以及黄河流域一带的汉人，为了避战乱、逃灾荒，这些汉人有过几次大规模的迁徙，主要是南迁，先迁徙到闽南闽赣交界的地区，以后又向南方各省及海外播衍。他们聚居在一起，保留着先民传下来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以及人文观念，甚至语言也保留着中原古汉语的语音，不与当地同化。房屋也筑成碉楼型，怕“外地人”侵犯。“从东汉末年到魏晋年间的‘庄园化运动’，即士族知识分子在庄园中滋生与培育出的独立自主精神，与官僚社会相抗衡，从而由庄园于战乱中发展为具有军事色彩的坞堡——这正是‘客家围’最早的历史。”（谭元亨《千年圣火：客家文化之谜·客家围——夯土的史书》）那时候，还有“东夷西狄，南蛮北胡”的说法，认为中原四周都是“野蛮人”，只有中原地方才是文化发祥地。尽管因为战乱或自然灾害，迁徙的汉人客居这些地方，还是不愿意和当地居民打成一片，环境和心理上都很戒备。而史学家们在研究这类人时，发现他们是“外来人”，便用“客家”这个词加以界定。凡是与客家有血缘关系的人，就被称为客家人。至今还保留着富有客家建筑特色的围龙屋、土围楼、名人故居、古老学府和民间艺术、民俗活动。

客家民居是客家历史文化的“缩影”，是一部客家历史、文化、建筑艺术巨著。它是客家人聚族而居，并且以夯土墙承重为特征的大型群体住宅。它始于唐宋，盛于明清，特色鲜明，类型多样，常见有围龙屋、门堂屋、土围楼、五凤楼、走马楼、四角楼等。客家围龙屋与北京的四合院、陕西的窑洞、广西的杆栏屋、云南的一颗印并称为中国五大特色民居。“人们统称为‘客家围’，是世界建筑史上独一无二的民居建筑。外国学者更称之为‘无与伦比的、神话般的山村建筑’。日本建筑师还把它叫做‘天上落下的飞碟，地下冒出的蘑菇’；而美国的间谍卫星，甚至把它误认为是中国东南沿海的巨大火箭发射场，闹出了一场虚惊——的确，从太空俯瞰下来，巨大的圆楼，太像火箭发射口了！”（谭元亨《千年圣火：客家文化之谜·客家围——夯土的史书》）



黄药眠的母亲阿德

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对年青一代产生的影响，是深刻而且久远的。这些具有客家特色的文化，雅的方面有楼联，如“诗书千载业，孝友一家春”、“有严有翼，攸芋攸宁”，“千秋事业承京地，十策家声继曲江”、“南州节度，华国文章”等，俗的方面有优美动听的山歌，如：

一送涯（我）郎出门帘，
妹子目汁（眼泪）是滚滚翻（流），
人家问涯（我）哭什么？
涯（我）郎今日要过番。

又如：

妹送亲哥到汕头，
一看大海妹心愁。
大海茫茫有止境，
妹想亲哥无尽头。
阿哥出门去过番，
妹子赶到晒禾滩，
双手牵住郎衣角，
阿哥几时转唐山。

.....

又过几年，那个白痴丈夫年龄也渐渐大了，但身体瘦弱，一点力气也没有，脑子又愚笨，他在家不仅不能给两个老人帮忙，反而增加了他们的负担。两个老人对他也不抱什么希望了，就在他十七岁那年，把他送到南洋去了。果然不出所料，他一去就再无声息了，于是我的母亲就由儿媳一变而为女儿。

.....

现在说起来，我的出生已经是八十年前的事了。至于我是怎样生下来的，我当然是浑浑噩噩，一无所知，不过就一般情况说，那时一个妇女要生小孩是神秘而又紧张的。据我所知，当时在我们小县城还没有专门接生的医生；生小孩子的时候，产妇所住的房子，房门窗户全部要关得紧紧的，再用布蒙起来，使得屋子里漆黑一团，密不通风，那是怕什么“锁子鬼”来危害婴儿和母亲。

究竟孩子怎样生出来的，只有在十多年后，我母亲生我弟弟的时候，我才从窗口偷偷窥视中模糊地知道一点个中情况。

首先要有个女人坐在屋角落里，然后让我母亲坐在她怀里，她把母亲紧紧抱住，另有两个女人分坐在母亲脚下，看来是好让母亲使劲时垫脚。请来的“接生婆”进来了，我记得，她指甲很长，指甲里藏着黑黑的泥垢。那时用具也没有消毒，不知道她是怎样把脐带剪断的。从我弟弟的诞生，我可以推断出，我也正是在这种条件下赤身露体带着母亲的血来到人间的，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的心脏开始公开在人世间跳动了，我的鼻孔也开始呼吸了。

在我出生的那天，肯定不会天上云中有什么隐约的仙乐奏鸣之声，屋上也不会有祥云缭绕，室内也不会有异香盈室。在母亲分娩之前，也不曾听说我母亲有过什么神人入梦。我就是这样平平凡凡地赤条条地来到人间了。我能够这样无灾无难地出来，这也真算是一个奇迹。

我可以确切地补充一句：我的父亲是谁，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母亲等来的“郎”，是个白痴，后来他就到南洋去了，而且一去也就永无消息。

.....

我母亲由儿媳一变而为女儿后，两个老人年龄也大了，一个没有文化的年轻女子如何奉养二老？再加上新铺圩唐博岭豪富子弟的欺骗、威胁、诱惑，小女子将来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等我长到懂人事的时候，我妈已经来到嘉应州同黄体仁同居了。后来，我就把他看成养父。

.....

小时候，我认为我妈是能解决无论什么困难的神，一有困难就找妈妈，有时她真的帮我解决了些问题。那是我三岁左右的事了，现在想起来还记得很清楚。当时很少吃水果，只在旧历新年前后能吃到一点，大家都吃，我妈也给了我一个。我一不小心，把核吞了进去，于是大哭起来，因为家里一个朋友曾开玩笑对我说

过，吞了桔子核，头顶上会长出一棵桔子树来。我妈妈不知道怎么回事，不明白我为什么会哭，这样安慰我，那样安慰我，可我越哭越厉害。妈妈这时才注意起来，问我“怎么回事，是不是嘴里什么地方疼？”我摇摇头，“是不是牙疼？”我又摇摇头，“是不是肚子疼？”我还是摇摇头。问到最后，我才含含糊糊说“吞了一个桔子核。”

“吞了一个小核有什么要紧？”

“……头顶上会长出桔子树来……”我哭得这样伤心，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谁告诉你的？你不要胡扯呀！”

“是叔叔对我讲的。”

“你不要听他的！不会的。”

我不相信，还是哭。

“那好吧，我吞两个给你看看。”

于是，妈妈吞了两个桔子核，这才解除了我的恐怖。妈妈对那叔叔很不满意，批评他说，“开开玩笑可以，但不要让孩子害怕起来啊！”

这虽是个小小的风波，但这件事，却深深地印在我幼小的心灵里。

我母亲很迷信，拜的菩萨是很多的，有佛教诸神如释迦牟尼、观世音、五百罗汉之类，又有城隍之类的属地方系统之神，还有不知根据什么经典由老百姓自己建立起来的神，如什么“玄天大帝”，“五显大帝”，“阴那山什么祖师”之类。我的母亲是逢神必拜，甚至离我们家门很近的土地公公、土地婆婆的木牌子，她每逢初一、十五也都要去烧香跪拜。有一次我对她的这些习惯表示不耐烦，说：“我们对这许多大的菩萨都拜过了，祈过福，土地公公土地婆婆当然也就知道会照办了，何必又走前去给他们烧香？”我母亲很不高兴，对我说：“你小孩知道什么？！你就听妈话，对所有上天下地的许多神都低头祈福就是。阎罗王、城隍爷爷当然知道我们是好人，会保护我们，但大神只管大事，小事他来不及管或没有工夫管，例如妈妈常带你出去看戏，半夜才回来，假如三岔路口碰见凶神恶煞要来勾引你的魂魄，城隍爷就未必能管得着了，你能得到土地爷爷的保护，那不就平安无事了吗？所以大神有大神的好处，小神有小神的好处，千万不要重这个神，轻那个神，这会使神也不高兴！”我当时年龄小，一点不懂得她的意思，现在阅世渐深，觉得她的话，虽然是出自迷信，但在人间也未尝不适用。真是大神有大神的作用，小神有小神的作用。即使你跟大神的关系好，但忽视了与下面小神的关系，也会搞坏事情。”（黄药眠《我的母亲》）

杰出的文学家总是无情地将蒙在现实表面的形形色色虚假的外衣撕去，让人们看到这个世界原本的真相，甚至是赤身裸体。而显露出来的这些本相，却正是一首生动的诗，一个深邃的哲理，甚或一个不朽的撼天动地的故事。